

論蘇聯的「自費出版」運動

陳 壇 津

一、Samizdat 的字義

Samizdat 這個字，雖常出現在俄國知識份子的詞句用語上，但是很難在蘇聯的字典上找到它。根據道察爾（Tamara Deutscher）的說法，Samizdat 顯然是在一九六四年左右，才開始出現的^①。但道察爾的說法，並沒有十足的根據。在專門研究 Samizdat 的學者中，以德雷欣（Julius Telesin）說的最為清楚。德雷欣表示^②，在一九五〇年代晚期，有些莫斯科地方的詩人等不及官方來出版他的詩集，於是就彙集他自己的打字稿，寫上 Samsebyaizzat，附個出版社的名字出版）。Samsebyaizzat 這個字，是仿照許多蘇聯出版社名字的模式，諸如：Politizzat（出版有關政治著作的出版社）、Voyenizzat（出版軍事著作的出版社）、Yurizdat（出版法學著作的出版社）等等，被發明出來的。Samsebyaizzat 意即：「某個人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社）在相同的意義下，也使用一個縮寫字——Samizdat（自己 publishing house for oneself）。而在莫斯科，Samsebyaizzatchik 在相同的意義下，也使用一個縮寫字——Samizdat（出版社）。於是，在使用縮寫字的情形下，這個字的原義也隨之改變和擴充了。現在重要的不是「我出版我自己的東西」，而是「我自己做出版工作」，而出版的作品，却不必是我自己的作品，只是我自己願意這麼做，不需要懇求任何人准許。我「出版」，表示：我以我能够做得到的方法，得到一篇作者的原稿，自然不用使用到印刷廠，因為印刷廠在蘇聯這個最「民主」的社會，是「屬於全民所有的」。

因此，今天許多蘇聯人「出版」他們自己的作品，以及其他東西，就有許多的「自己出版社」，這類出版社通譯 Samizdat

註^① See Tamara Deutscher, "Intellectual Opposition in the USSR," in *New Left Review*, No. 96, (March-April 1976), p. 102.

註^② Julius Telesin, "Inside 'Samizdat,'" in *Encounter*, Vol. XL, No. 2, (Feb. 1973), p. 25.

。而所有從這個「自己出版社」出版的出版物，也通稱之為 Samizdat。也就是說，Samizdat 這個字，可以用在下列的情況之中：「在 Samizdat 中流傳着」、「被傳播於 Samizdat」，或者說，作者把他自己的作品，「放進 Samizdat 裏面出版」^③。

為了後面敘述方便起見，現在筆者用統一的名稱，稱之為「自費出版」，而且是只指涉出版物。「自費出版」，經過以上的整理，如果單純指出版物而言，就有兩個概念：出版物本身，應是由各種蘇聯非官方的出版社所出版，而且是透過蘇聯非官方的傳播機構發行的出版品所組成，才能叫做「自費出版」。由此概念，「自費出版」，也可以是書籍，也可以是期刊或文件。

目前西方對「自費出版」的觀念有些混淆，把從蘇聯偷運出來，而以再版、照相或翻譯的方式所印行的蘇聯「自費出版」書籍、期刊和文件，也叫「自費出版」。這實在是一個大的錯誤。事實上這種產生出版物的方式，應該叫做 tamizdat (tam 是指西方而言，tam 等於那裏)^④。tamizdat 就是表示「西方所出版的出版物」。但是，西方還沒有那種習慣，因此連帶的，也把「自費出版」的概念搞混了。究竟「自費出版」是指打字或其他方式書寫的原稿，或是指只有開始被複製的製成品才叫「自費出版」，現在仍然是不清楚。

二、「自費出版」的起源與內容

「自費出版」的現象，起源很早。在沙俄時代，由於第三廳對於出版的嚴格控制，拉第謝契夫 (Alexander Radishchev) 就曾經進行過這種活動^⑤。十九世紀赫爾岑 (Alexander Herzen) 以及科拉夫金斯基 (Sergi Kravchinsky)，也有過這種例子。但是「自費出版」蔚成一股風氣，並且形成一種知識份子的運動，正式開始於赫魯雪夫上台之後。

在赫魯雪夫上台之後，蘇聯的知識份子因為要求蘇聯當局放鬆對自由的箝制未果，此時已經有一種運動，叫做「文化反對派

註② 很少研究蘇聯異議份子運動或民主運動的研究者，曾經這麼清楚的指出 Samizdat 這個字的使用方式。一般把相關於 Samizdat 的文件或活動，均稱為 Samizdat。這些例子，可參考下列作者在他們文章中的使用方式。見 T. Deutscher, *op. cit.*, p. 102; Alexei A. Yakushev, "The Samizdat Movement in the USSR: A Note on Spontaneity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Russian Review*, Vol. 34, No. 2 (April 1975), pp. 186-193; Cornelia Gerstenmaier, *The Voices of The "Silent"*,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2), pp. 23-27, 101-142, 143-149; Gayle Durham Holland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Dissent in the Soviet Union," in *Dissent in the USSR: Politics, Ideology, And People*, edited by Rudolf L. Töké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63-268.

註④ See J. Telesin, *op. cit.*, p. 26; G. D. Hollander, *op. cit.*, p. 264.

註⑤ See Avrahm Yarmolinsky, *Road to Revolution: A Century of Russian Radic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9), Chapter I.

」（Cultural Opposition）^⑥。「文化反對派」運動的特徵，是蘇聯的作家用手稿的方式流傳他們的作品，出版業者出版打字的雜誌，藝術家舉辦半合法的藝展，戲劇家組織自己的劇團等等，來反對蘇聯當局的文化政策。後來蘇聯當局連此運動也橫加阻撓，「文化反對派」運動遂孕育出另外一種新的運動。

新產生的這種運動，不僅僅反對蘇聯官方的文化政策，而且擴大了範圍，連帶着也反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意識形態及其在實際生活方面的各種作爲。新的運動的出現，現在扮演着蘇聯政治生活中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蘇聯社會羣衆希望能夠得到更多有關蘇聯社會，以及政治生活的情報，另一方面，蘇聯政府當局則努力想完全的控制着供給社會羣衆的各方面情報，而新的運動就在這個對立的夾縫中，替社會羣衆傳遞情報，並且打擊蘇聯政府的威信^⑦。

這個新的運動，就是舉世聞名的「自費出版」運動。它的內容，開始時，主要是文學。但文學在俄羅斯民族的傳統中，向來富有政治的意味，所以實際上，它在開始時，就是政治性的運動。

下面是迄今已知流傳於「自費出版」運動中的資料內容^⑧：

1. 文學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歷史故事、劇本、詩篇、回憶錄、自傳與歌謠^⑨。
2. 消息與報導：包括有關蘇聯異議份子爭自由的活動與受迫害的情況，以及來自蘇聯國外支持此等活動的宣言等等的消息評論，或者速記報導與政治事件的說明（如搜索、逮捕、示威、審判、集會、與秘密警察的「對話」、心理分析臨床實驗過程、主要的文學家或異議份子的葬禮），或者監禁場所的報導（如精神病院、集中營和監獄）。
3. 異議份子及其支持者的請願書、宣言、公開信、抗議書、傳單以及通信記錄。
4. 有關種種主題（如捷克與南斯拉夫事件的分析、異議份子的發展、猶太人或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地位等等）的分析論文和哲學論著。
5. 異議份子被強迫入精神病院與犯罪的記載，被迫害者的傳記與服刑記錄。
6. 官方文件：包括蘇聯簽訂的國際條約、宣言、公約與協議；重新翻印的蘇聯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庭判例；精神病臨床檢查報告；秘密的諭令條文等等。

註⑥ See Andrei Amalrik,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0), p. 7.

註⑦ Ibid., p. 8.

註⑧ 表列出之資料，參考由 Julius Telesin, *op. cit.*, pp. 26-27; G.D. Hollander, *op. cit.*, p. 265.

註⑨ 歌謠也以錄音帶的方式流傳，並形成一種「磁帶錄音出版」（Magnitizdat）運動。關於這個主題的詳細內容，請參看 Gene Sosin, "Magnitizdat: Uncensored Songs of Dissent," in *Dissent in the USSR: Politics, Ideology, And People*, edited by Rudolf L. Tökés, pp. 276-309.

7. 色情文學。

8. 「自費出版」資料的摘記。

9. 零篇散稿：包括蘇聯報紙有關特殊題材的摘記、重印的某些舊報紙上有趣的文章、在合法的出版作品上被檢察官抽減和刪掉的文句、重印合法出版作品上的有趣內容，以及重印的出版於海外的文章等等。

三、「自費出版」運動的主要出版刊物

發表上述資料內容的異議份子主要刊物，目前已知的，數目並不太多。現將「自費出版」運動出版刊物的主要期刊刊名、出版地、主編、撰稿員、出版目的與性質等，略述於後，以明其中大要。

1. 「布莫朗」(*Boomerang*) ..^⑩

主編：奧希波夫(Vladimir Osipov)。

出版地點：莫斯科。

出版時間：一九六〇年繼「辛塔卡斯」雜誌(Syntax)停刊後，出現於莫斯科。

撰稿人：已知有庫茲涅索夫(Eduard Kuznecov)一人。

2. 「蘇聯人權大事記」(*A Chronicl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USSR*) ..

主編：查尼茲(Valery Chalidze)。

出版時間與地點：仍不清楚。

宗旨：報告人權運動的活動概況。

撰稿人：仍然不知。

3. 「不死鳥」(*Feniks*) ..

主編：「不死鳥」有兩種，首次出現於一九六一年，一般通稱 *Phoenix I* 或 *Phoenix 1961*；此項雜誌停刊後，一九六六年續有以「不死鳥」為名稱的雜誌出現，一般通稱 *Phoenix 1966*。*Phoenix 1966*是由格蘭斯柯夫(J. Galanskov)主編的；*Phoenix 1961*則不知是誰主編的。

出版地點：莫斯科。

註^⑩ Boomerang 意指澳洲土人以木製用來獵物，並能自動盤旋飛回的武器。也引伸其意為：發言者自蒙其害的辯論或提議。

內容：公然要求革命，富政治性。但是主要是詩選，整本雜誌由一百四十頁打字稿組成。沒有人知道該雜誌目前流傳的情形，發行量要比「辛塔卡斯」少^⑩。

撰稿人：撰稿人是由莫斯科區學校幾個被開除的學生所組成的，計有廿三個，現知道的是：佛拉第米洛夫（A. Vladimirov）、郭邦尼夫斯卡婭（N. Gorbanevskaya）、摩爾卡洛伯（M. Mercalob）、奧涅茲卡婭（A. Onezskaya）、諾爾（N. Nor）、尼爾斯基（V. Nilsky）、格蘭斯柯夫、布柯夫斯基（Vladimir Bulkovski）、庫茲涅索夫（Eduard Kuznecov）、奧希波夫、雅柯布森（Anatoli Alekoandrovich Yakobson）等人。

4. 「自由的先鋒」（*Laisves Šauklys*）..

主編：目前不知。

出版時間：一九七六年五月。

內容：以討論社會問題為主。

撰稿人：目前不知。

5. 「社會主義民主雜誌」（*The Magazin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出版於莫斯科，目前不知主編是誰，僅知有撰稿人雷維汀（Anatoli Levitin，又化名為 Krasnov）一人。

6. 「俄國的話」（*Russkoe Slovo*）..

主編：弗希雷桑斯基（Vladimir Voshresensky）和庫雪夫（Yevgeni Kushev）。

出版時間：一九六六年五月，由「李列夫俱樂部」（Ryleev Club）^⑪創刊。

出版地點：聖彼得堡（列寧格勒）。

內容：以文學、藝術、文化、歷史、哲學以及其他種種問題的討論為主。

撰稿人：皮沙略夫（D. Pisarev）、察塞也夫（V. Zaitsev）、薛爾干諾夫（N. Shelgunov）、薛契波夫（A. Shchapov）等人。

7. 「蘇芬克斯」（*Sfinksy*）^⑫ ..

註⑩ See Cornelia Gerstenmaier, *op. cit.*, p. 103.

註⑪ 「李列夫俱樂部」是「羣衆黨」八一五年俄國十一月黨人的份子所組成的會社。它成立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繼承十一月黨人的「俄國的話社」（Society of the Russian Word）關於其宗旨與意義，見“Literature of the Undergrounds,”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 No. 5, (Sept.-Oct. 1968), pp. 66-68; C. Gerstenmaier, *op. cit.*, pp. 522-525.

註⑫ 「蘇芬克斯」（Sfinksy），是埃及人面獅身之雕刻巨像，其意亦為「謎似的人」。

主編：塔爾希斯 (Valery Tarsis)。

出版時間：一九六四年，地點是西方。

內容：非官方的詩選集。

撰稿人：柯夫欣 (V. Kovshin)、史提番諾夫 (J. Stefanov)、果羅玟 (Yevgeny Golovin)、米海洛夫 (Articni Mikailov) 與加利希 (Aleksandr Galich)。

8. 「辛塔卡斯」..

主編：金茲保克 (Aleksandr Ginzburg)。

出版時間：此雜誌首先出現於一九五九年，再出現於一九六〇年。

出版地點：莫斯科與列寧格勒。

對象：廣大的讀者羣。

出版份數：1110—11100份。一般人認為這份期刊只發行過五期。

撰稿人：許多投稿人是在一九五六年從列寧格勒學校被開除的學生，例如…阿哈馬杜里那 (Bella Akhmadulina)、潘克拉斯托夫 (Uri Pankratov)、奧庫札瓦 (Bulat Okudzava)、史奴次基 (Boris Slutsky) 等均是。

註：一九六〇年因警察的壓迫，此雜誌被迫停刊。

9. 「史莫格」 (SMOG) ^⑭ ..

主編：不知。

出版時間：一九六〇年代早期。

出版地點：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蘇聯其他地方。一九六五年又因雜誌發行地點的不同，因此「史莫格」雜誌又分「南史莫格」 (*Jugo smog*)、「烏拉爾史莫格」 (*Ura smog*) 與「敖德塞史莫格」 (*Odessa smog*)。

內容：以保護俄國文化傳統，以及恢復革命前俄國藝術之傳統為主。

活動：「史莫格」雜誌也秘密發行「蘇芬克斯」、「前鋒 I 及 II」 (*Avangard I and II*)、「史莫格」詩選以及傳單「

註^⑭ 「史莫格」 (SMOG)，是此四字 Smelest (勇敢)、mysl (思想)、Obraz (體會)、glubina (深度) 條出四字 Samoe molodoe obedinenie geniev (最年輕的天才協會) 的簡稱。

諺」（*Cne*）^④。

撰稿人：金茲保克、辛尼亞夫斯基（Andrei Siniavski）、維尼夫斯卡娅（Julia Visnevskaya）、日塞也夫（Vladimir Batshev）以及庫伯蘭諾夫斯基（Yuri Kublanovskii）等。

10.「社會民主筆記」（*Tetradi Socialisticeskoy Demokratii*）..

主編：目前仍然不知。

出版時間：一九六五年。

出版地點：莫斯科。

內容：詩、歷史研究及道德問題等。

撰稿人：葉夫祖生柯（Yevgeny Yevtushenko）、柏羅第斯基（Brodski）、雷維汀等人。

註：此雜誌發行一年即停刊，可能已被籍沒。

11.「時事大事記」（*Chronika Tekuschnich Sobyij*）..

主編：目前只知郭巴妮維斯卡婭（Natalya Gorbanevskaya）是此雜誌的創立者之一。

出版時間：一九六八年四月卅日第一期出現。

出版地點：莫斯科。

內容：每一期均包括政治審判、政治犯、奴工營、精神病院、其他「自費出版」的發行、對少數民族以及對宗教團體的壓迫等等的消息與文件。

出版狀況：此雜誌是定期的雙月刊，至一九七八年年底為止，據西方已知的消息顯示，已出版了四十五期^⑤。

12.「鐘聲」（*Kolokol*）..

主編：「共產主義者聯盟」（Union of the Kommune Members）。九名領袖中，已知名的是隆金（Valeri Ronkin）。

出版日期：一九六五年。

出版地點：列寧格勒。

出版份數：據列寧格勒的「鐘聲」第廿四期報導，該雜誌已達一千份的發行量。

註④ C. Gerstenmaier, *op. cit.*, pp. 112-113.

註⑤ 「時事大事記」四十五期全部由詳報內容，見 London 和 Boston 號 Routledge Journals 挑版，「國際赦免協會」（Amnesty International）譯與發行處 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

內容：以馬克思主義為號召，反對現行於蘇聯的共產主義形式。

撰稿人：全皆匿名。

除了以上十二種刊物外，蘇聯的「自費出版」尚有只知期刊刊名的雜誌，諸如：「曙光」(*Akīra*)、「藍芽」(*Golubys* *Kronika Buton*)、「新聲」(*Svezie Gdosa*)、「異端」(*Fres*)、「立陶宛天主教大事記」(*Lietuvos Kataliku Bažnyčios Kronika*)、「烏克蘭先鋒」(*Ukrainian Herald*)、「烏克蘭信息」(*Vestnik Ukrayny*)、「出埃及記」(*Ischod*)、「雞尾」(*Koktejl*)、「季節」(*The Seasons*)、「無花果葉」(*Figovyy List*)、「燈籠」(*Fomar*)、「工場」(*Workshop*)、「海妖」(*Sirena*)、「頸」(*Seja*)、「蘇聯病理學文集」(*Anthologiya Sovjetskoy Patologii*)等。

四、出版活動與流傳情形

蘇聯許多的作家，寫東西是爲了擺在抽屜裏，他們常不願意把他們的作品拿到官方的出版社出版，因爲，他們知道，這類的作品無論怎樣，是不會被准許出版的。有些作家則把他們的作品拿給朋友閱覽，但是反對漫無控制的流傳。這些人是希望有朝一日他們的作品還能够正式的出版。蘇聯有另外一批作家則等不及出版，便想把他們的作品立刻送達讀者的手中。於是，他們就把他們的作品放進「自費出版」裏面。因此，「自費出版」的流傳時常和它們的出版，是同時發生的^⑦。先說出版。

在通常情況下，「自費出版」的方法是用打字。打字機在現今的蘇聯，不再像往常那樣受到嚴格的控制。文學家與研究工作者往往在工作場所或家裏，都有部打字機。當然，大部份的「自費出版」打字工作，都是在家裏進行，因爲打字是件辛苦的工作，一個打字員通常就要打五、六份的拷貝^⑧。其次，打字員的找尋，也是打字的「自費出版」一件重要的工作。如果原稿件只有五張打字紙，通常自己就可以應付得了。但是如果是由大部頭的小說，就非得找到願意擔當打字工作的人員不可。通常打字員都是在朋友之間尋覓，而且找尋多人以節省時間。打字員願意擔當「自費出版」的打字工作，有些是爲了錢，有些純粹是出於熱心。因此打字的「自費出版」工作之速度，通常也須視打字員的精神狀況和分配工作的方法而定。

另外，打字「自費出版」的技術問題，例如：紙、複寫紙、打字空行等等，也是必須解決的事情。紗紙或薄紙，在技術上比厚紙易於處理。但紗紙或薄紙以及複寫紙在蘇聯不易大量的購得，而且大量的購買容易啓疑。通常都是打字員和作者分別找幾個朋友，購買少量並分幾次購得。打字空行的處理，也須視環境而定。空一行打字，視力不良的讀者不易閱讀；空兩行打字，則容易增加出版品的厚度並且浪費紙張，因此只能權宜處理。

註^⑦ A. A. Yakushev, "The Samizdat Movement in the USSR: A Note on Spontaneity and Organization," p. 188.

註^⑧ 依據德雷欣的估計，五六份的拷貝通常並不足以應付需要，見 J. Telsin, "Inside 'Samizdat,'" p. 30.

「自費出版」的第二種方法是照相製版。照相製版是技術上更複雜的方法。底片與相紙容易取得，但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怎麼製版。而且在開始製版時，製版的底稿必須清楚，相紙也比普通紙厚。一部大的照相拷貝的成品，往往比一部打字拷貝成品，要更占空間。照相製版的好處，只在於迅速確實與大量的生產。而且由於在蘇聯照相器材與設備受到管制，因此這種方法並不見得盛行。

「自費出版」的其他方法，尚有利用電腦與電傳影像製版等等方式進行的，例如刊在「時事大事記」上的文件與消息。這些方法精確快速，而且提供許多意想不到的情報。不過，這些器材屬於高級工業技術的產品，非一般的蘇聯人民可以使用，或者可以接近的。「時事大事記」從不同的來源，接獲大批用這類方法傳遞出來的消息，相信在蘇聯是有高階層的學者、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在積極的從事着「自費出版」的出版工作⁽¹⁹⁾。

至於流傳的情形，花樣更多。不管「自費出版」的出版方法是用打字或者照相製版的，其完成品不是散頁的集合體，就是裝訂成冊的一本著作。成品的裝訂方式，是各有利弊。雖然散頁容易損壞、弄髒或遺失，但它的好處是能够給許多人同時閱覽，廣為流傳；其次收藏也很方便。用散頁，一次多人同時閱讀的流傳方式，可以行之於法庭的走廊和私人的聚會場合，同時再出版也方便。

裝訂成冊的流傳方式，好處是完整耐久，不易散失，可是除非是高聲的朗讀，否則這種方式一次只能一個人閱讀；再出版也較費時日。

上述方法折中的方式，是分數本裝訂流傳。它兼有上述兩種方法的優點。現有許多證據指出，就蘇聯目前「自費出版」的成品大小、厚度以及流傳的規則性看來，「自費出版」運動已成爲史無前例的高水準活動。像此類的「自費出版」流傳網，已經從大城市往小城市作輻射狀的自動發展起來。靠着現代蘇聯工業的幫助，蘇聯讀者能够接近「自費出版」的數量，幾乎等於一個主要的莫斯科出版社每年的出版數⁽²⁰⁾。

五、「自費出版」的法律地位

「自費出版」往往被西方認爲是蘇聯境內的「地下」刊物⁽²¹⁾，其實這也是一種習慣性的誤解。「自費出版」並不是「非法的

註⁽¹⁹⁾ See C. Gerstenmaier, *op. cit.*, p. 193.

註⁽²⁰⁾ A. A. Yakushev, *op. cit.*, p. 188.

註⁽²¹⁾ See G. D. Hollander, *op. cit.*, p. 263.

」出版物，它只是「沒有經過檢查」或「非官方」的出版物^②。依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等五十條的條文規定：

「為符合人民利益並為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保證蘇聯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會議、遊行及示威之自由。實現此類政治自由之保證為：給勞動者及其組織提供公共建築物、街道及廣場、廣泛傳播消息，利用報刊、電視、與無線電廣播之可能。」^③

因此，蘇聯沒有法律明文禁止蘇聯人民發行「自費出版」物，也沒有以立法，臚列禁書的「黑名單」，當然「自費出版」就不是「非法」。更且，「自費出版」的作品，作者常在文後附加上自己的簽名，並且寫明自己的地址，無論如何是沒有任何「非法」的問題。蘇聯最有名的「自費出版」出版物「時事大事記」，就曾經基於它只記錄事實與事件，聲明它本身是「合法」的刊物。它說：

「『大事記』決不是一種非法的出版物，只是它的工作情況，受到長期確立於某些蘇聯機構中的通訊自由與合法性之特殊概念所阻礙而已。因為這項理由，所以『大事記』不能像其他任何刊物一樣，在最後一頁寫上它的郵政地址。」^④

「自費出版」會變成非法，照弗里特保（Maurice Friedberg）所說的，是因為蘇聯當局決定使它們成為非法^⑤。在蘇聯，「自費出版」轉入地下，是因為它們的出現，未獲政府當局的合法批准，却不是因為它們的內容冒犯了官方的出版法令。因此，我們對於西方報紙常把「自費出版」列上「地下」的標題，就須審視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在蘇聯，法律只存在於紙上，而政府當局則可隨意自作決定。政府能夠違犯法律，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蘇聯人民事先已經同意政府違犯，而且他們準備承認任何違反當今統治者的活動——儘管與蘇聯法律不相抵觸——都是「地下的」。所以，「合法」變「非法」，決定於「自費出版」活動的形式，而非內容。往往「自費出版」被政府沒收，「自費出版」的持有者被判徒刑，罪名是「反蘇」或者「裏通外國」，但「自費出版」出版物却不算罪名成立的「物證」。因此，「自費出版」在蘇聯根本不能說是「非法」。

註^② C. Gerstenmaier, *op. cit.*, p. 25.

註^③ 畢英賢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根本法）」，出自「世界各國憲法大全」，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編印，臺北，出版年月不詳，頁一一一。

註^④ Peter Reddaway ed., *Uncensored Russia: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1972), p. 54; J. Telesin, *op. cit.*, p. 33.

註^⑤ See Maurice Friedberg, "What Price Censorship?"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I, No. 5, (Sept. - Oct. 1968), p. 19. 亦譯為亞·A. Yakushhev, *op. cit.*, p. 192.

六、西方的支援

爲了「自費出版」資料的公佈，西方許多團體現在已經進行了多種工作，以協助它完成這種任務。

在俄國流亡團體中，就有下列幾種刊物，是積極的爲了發行「自費出版」的資料而設的，例如：在西德法蘭克福的「界標」(*Grenz*) 跟「播種者」(*Posev*)，在紐約的「新俄國的話」(*Novoe Russkoe Slovo*) 與「俄羅斯思潮」(*Kusskaiia Mysl*) 等等。其中，設址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亞歷山大赫爾岑基金會」(The Aleksandr Herzen Foundation) 最近在這些刊物的出版方面，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此基金會的榮譽理事，包括有斯拉夫文學主要批評家雷衛(Karel van het Reve)(萊登大學)、歷史學家貝則梅爾(Jan Bezemer)(阿姆斯特丹大學)、和政治學家雷大衛(Peter Reddaway)(倫敦大學)。「亞歷山大赫爾岑基金會」充當這批仍住在蘇聯、但其作品被蘇聯政府禁止出版的作者之發行人與信託者。由基金會出版的作品之收入，與這些由「播種者」出版社公佈的「自費出版」資料的收益，全部都以特別帳號用這些作者的名義儲存起來，希望有一天這些作者都能收回他們自己應有的權益與榮譽[◎]。

西方的電台協助「自費出版」的，計有慕尼黑的「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英國的「英國廣播公司」(BBC) 和美國以俄語發言的「美國之音」(Voices of America) 等[◎]。這些電台，形成蘇聯「自費出版」資料的轉播站。普通來自蘇聯人民的呼籲與信函，時常會被送到這些外國電台，然後再播給蘇聯的聽眾。這些蘇聯內部異議份子的文件，通稱 *radizdat*。外國廣播公司的錄音記錄，則稱 *Magnitizdat*。據「自由電台」在一九六九年估計，在蘇聯總數八千六百五十萬能收聽的人口裏面，就有二千七百萬人收聽這種廣播；而目前已超過二億五千萬人。因此，這些外國的大衆傳播，無異是變成了蘇聯境內「自費出版」傳播網的一種延伸。

另外，自一九五〇年代晚期以來，蘇聯境內的「自費出版」出版品，送抵西方的，已經超過一千五百種。這些文件，有些已由幾個俄文、烏克蘭文和立陶宛文流亡者出版社、日報和政治社會或文學刊物，以原文發表；其他的文件，則由西方幾個商業出版公司或學術性刊物譯成西方文字，從事出版和發售。一九六〇年代晚期，慕尼黑「自由電台」的研究幕僚人員，開始收集大部份這些散亂的資料，以及上百件其他「較少新聞價值」的項目，並且加以分類。不久，「自費出版檔案」(Arkhiv Samizdat) 機構成立。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特別安排了下列四所美國和四所歐洲的陳列圖書室，以使「自由電台」自費出版檔案的內容

註[◎] See C. Gerstenmaier, *op. cit.*, pp. 15, 25-26.

註[◎] See G. D. Hollander, *op. cit.*, pp. 259-260.

，能够公諸於世。下面是這八所圖書館的地點所在^⑧：

美國：國會圖書館斯拉夫與東歐司，地址：Washington, D. C. 20540；俄亥俄州立大學斯拉夫與東歐研究中心，地址：Columbus, Ohio 43210；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地址：Cambridge, Mass. 02139；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地址：California 94305。

歐洲：大不列顛博物館斯拉夫與東歐司的印書部，地址：London WC1；巴威略國立圖書館東歐部，地址：Munich 34, Germany；波得萊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斯拉夫區的印書部，地址：Oxford OX1 3BG, England；阿姆斯特丹大學東歐研究中心（與「亞歷山大赫爾岑基金會」合作），地址：Amsterdam, Holland。

七、「自費出版」的意義

「自費出版」運動自出現迄今，將近三十年。在這期間，蘇聯境內未經過檢查的出版物已經達到相當大的比例，這正反映出黨與知識份子之間日見加深的衝突^⑨。蘇聯境內進行這種「自費出版」運動的知識份子瞭解：這個世界應該知道另一面俄國的內容，因此他們避開檢查，把他們的文件運用各種方法，送抵西方自由世界。同時，他們這樣做，也是因為他們想讓蘇聯的人民，廣泛的瞭解世界與蘇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目前，西方自由世界能够知道蘇聯境內的壓迫與審判，蘇聯人民能够清楚的知道捷克事件等真相，都是靠「自費出版」這種秘密的溝通網道。

蘇聯政府對這種運動的壓迫，持續時期相當長久^⑩，但是都無法遏止；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當局想保有合法性的面貌，不過法律不够明確，犯罪的意圖與實際違犯之間規定得不够清楚，處分失據，因而一直使蘇聯政府處在尷尬的情況之中^⑪。當然「自費出版」的散播，直接威脅到蘇聯政府政治溝通的傳統。因為，向來只有蘇聯的政府（黨），是蘇聯消息與現實解釋的來源，現在却突然有了另外一條溝通的網道。無疑的，「自費出版」是向蘇聯政府的權威挑戰。因此，消極方面，第一，「自費出版」向蘇聯人民提出不同的象徵與政治行為，間接的就腐蝕了蘇聯人民在蘇聯扮演「政治順民」的角色；第二，個人應為政治信仰

——[轉第 110 頁]

註^⑧ See "A Note On Self-Published (Samizdat) Sources", in *Dissent in the USSR: Politics, Ideology, And People*, edited by R. L. Tökés, pp. XIII-XIV. 亦譜參 Albert Boiter ed., *Archiv samizdat, Register of Documents*, 2d rev. ed., (Munich, 1974).

註^⑨ See C. Gerstenmaier, *op. cit.*, p. 22.

註^⑩ 關於蘇聯政府對此運動的壓迫，請見 Frederick C. Barghoorn, "The Post-Khrushchev Campaign to Suppress Dissent: Perspectives,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of Repression," in *Dissent in the USSR: Politics, Ideology, And People*, edited by R. L. Tökés, pp. 35-95.

註^⑪ See A. A. Yakushev, *op. cit.*, p. 192.

備，在經互會範圍內則求自給自足，或且本身在謀求以對社會主義國家貿易盈餘，抵補對西方的貿易赤字。

一月十九日蘇聯中央統計局發表一九七八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執行結果，其工業成長率爲

工業生產遲滯不前 四·八%

去年十一月底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時，巴依巴可夫報告中，估計去年工業成長率爲五%，實績僅四·八%，較預估爲低，但較原定年度成長目標四·五%略高。按蘇聯一九七七年工業成長率爲五·七%，一九七八年降低幅度頗大，僅可與低成長之一九七六年相埒。

依同（十九）日「消息報」揭載統計數字，生產資料部門成長率由巴依巴可夫報告之五·三%，降爲五%。按生產不振之一九七六年成長率亦達五·五%，去年實績落後不少。生活資料部門一九七六年成長率爲一·七%，去年爲四%，較一九七六年爲高。然肉類生產去年僅增三%，未完成年度指標，而牛油則較一九七七年降低二%。

——上接第88頁——

以及行動負責的概念，不僅因爲「自費出版」的內容，而且也是因爲溝通的形式與方法，逐漸散播於蘇聯的專家階級裏邊，顯示了個人懷疑與抵抗政府當局能够連結社會羣衆利益的能力。第三，「自費出版」干涉了官方政治溝通系統的政策功能，說明了個人與團體的利益與官方的路線有所不同，於是使人民對官方的路線產生疑問。

積極方面，「自費出版」的溝通網道企圖彌補官方政治溝通的缺陷，允許蘇聯人民接近被禁止的消息，提供了蘇聯人民發表意見的園地。因此，第一，「自費出版」能够有效的打破官方提出的政治神話；第二，「自費出版」能够減少蘇共對於其所提蘇聯社會中的世界觀之控制；最後，第三，「自費出版」能够腐蝕蘇共的合法性。

基於上述消極與積極的功能，「自費出版」在蘇聯的出現，便取得重大的意義。在短期方面來說，由於「自費出版」在政治溝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蘇聯政府一定會加緊迫害，可是由於「自費出版」變成民意產生的重心，再加上西方輿論力量的支持，蘇聯政府在施壓力時可能對各種利害關係會加以考慮，因而使剛開始萌芽的蘇聯異議份子的團體或組織，得在這種空隙中發展與茁壯，「人權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的成立，即是一例。在長期方面，咸信只要蘇聯的異議份子組織繼續存在，這批具有批評勇氣的知識份子一定能取得蘇共中堅自由份子的支持，那麼整個蘇聯政治文化自由化目標的達成，也就爲期不遠了^②。

註^② G. D. Hollander, *op. cit.*, pp. 273-275; A. A. Yakushev, *op. cit.*, pp. 192-193